

第六章

擔任總統座機長十年

第1節 進入「委員長侍從室飛機管理室」

1943年至1952年，我受命擔任總統座機長。這十年，正是蔣總統生命中，大喜大悲、巨變轉折的時刻；也是中國近代史中最波瀾壯闊卻又斑斑創傷的十載。

1945年抗日勝利還都，我駕駛的飛機中，坐著英武雄姿的蔣委員長；三年後黯然下野，我的飛機載著淒然苦澀的蔣總統；1949年，我的飛機載著容顏黯淡的蔣總統來到了台灣。

烽煙十年，風雲十年，我的飛機做了一個大時代的歷史見證。

我在學生時代和擔任飛行員時，曾數次遙見過蔣委員長。但是，首次見到蔣委員長，是在1940年4月，由於我在支援崑崙關作戰以及大達機運輸的工作表現，接奉蔣委員長召見的通知。那時我正決定4月9日與瑛華結婚，很多人恭賀我「雙喜臨門」。

那次是一批人同時召見，蔣委員長並沒有特別注意到我。1942年12月，我駕C-47運輸機，飛越大西洋返國。1943年1月29日蒙蔣委員長在重慶中四路103號官邸召見慰勉並賜宴，委員長並命名此架C-47運輸機為「大西洋號」。

當時，委員長出訪，都由「委員長侍從室飛機管理室」派機接送。管理室擁有各型飛機數架，包括Ford Trimotor、Junkers Ju52、Boeing 247、Sikorsky S-43

等；法、義、美飛行員都有，由一位德籍顧問史坦納司（Stennis）上尉主管。大概是管理不當，到1942年所轄飛機已全部毀損，「飛機管理室」只剩史上尉一人。據說後來他以德國籍的身分，被派去上海照顧蔣夫人的房子；那時正在抗日戰中，德國人以軸心國的身分，可自由進出日軍佔領的地區。

1943年的一天，航委會周至柔主任把我叫去，要我準備載委員長及夫人飛去貴陽，那是我第一次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務。為鄭重起見，我先飛貴陽測試航線及場地。次日即由重慶航站人員在飛機上綁了兩張藤椅，就成了委員長座機。而C-47只是一架運輸機，既無空調，又無隔音，只有兩排運兵用的鋁製座位。元首夫婦坐藤椅，侍從則分坐兩旁「冷板凳」。好在路途不遠，飛行時間不到兩個小時，但對一個元首來說也確實委屈。抗戰時期也只是一切從簡了。以後，蔣委員長每次出巡，均照此辦理。雖然辛苦，但蔣先生也別無選擇。

第2節 「美齡號」

1945年4月12日，美國總統羅斯福因腦溢血去世，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。值此大戰的關鍵時刻，杜魯門繼續加強與同盟國之間的合作；他為了對我政府示好，特別贈送了一架座機給蔣委員長。

我得到接收該新機的命令後，即從成都隊部前往重

慶九龍坡機場。只見一架嶄新的銀白色C-47已由美國飛抵此地。機內陳設考究而舒適，除了沙發座椅外，前艙設有一間辦公室，一張軟床。後艙則有沙發座十餘個，以及廁所和簡單廚具。比起原來的「大西洋號」強得太多，空調及隔音在當時亦堪為上乘。

這架從美國本土飛來的C-47上，還載著許多用紙箱包裝的「貨物」。我查看上面的標示，原來都是註明運交重慶孔二小姐的物品；等到委員長官邸的人前來提領之後，我就將空機飛返太平寺基地，正式納入空運隊的編制之內，而我自己也從此成為專任駕駛。該機由蔣委員長命名為「美齡號」，空軍編號為219，另調汪正中（航校十三期畢業）為副駕駛，王堃和負責通訊，孫基宗、王英哉、鄧必成為機務員。孫、王二人是韓國人投奔我國，習航空機械後派空軍服務。戰後孫至中國航空公司服務，王則回韓國，曾任釜山空軍供應處長，並恢復原來姓氏，正名為金英哉。鄧必成則仍留空軍座機組工作，目前已退休住在嘉義。汪正中不幸於1997年患敗血症在美國去世。王堃和一直服務於空軍，後為蔣經國先生賞識，被調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擔任總務處長十七年之久；現亦退休，在台灣淡水「潤福生活新象」，與其夫人顧女士安享晚年。二老均年近九秩，身體仍佳。以上這些人，在當年，對空軍特別是總統座機，均有貢獻。

在抗日戰爭末期，「美齡號」擔負了很多蔣委員長出巡的任務。直到1946年C-54「中美號」到來，它才退

居次位，出勤的次數也大大減少。

第3節「中美號」

抗戰勝利，全國歡騰，蔣委員長的聲望更高達雲霄。國人為表崇敬，多有表現；其中之一即為中國航空公司奉獻DC-4（C-54）豪華座機一架。但後來周至柔將軍告訴我：這架飛機名義上是中航所獻的，實際上這家中美合資的公司，在董事會上，贈機事被美方所否決；只好由宋子文先生決定，由財政部付全部造價一百八十八萬美金。

該機由美國人飛到上海，我奉命前往接收。當即派汪正中、傅保民、汪積成、楊基旭、鄧必成等機組成員，前往上海江灣機場。第一次見到這架巨大的飛機，果然不同凡響。除了性能比C-47強了很多以外，其內部陳設，更是琳瑯滿目。當時美國總統的座機，也是一架稱為「聖牛號」（Sacred Cow）的C-54；它為了羅斯福總統乘坐輪椅登機方便，還特別裝置了升降機。而我們這架C-54的登機樓梯，也是以電力操縱的。進入艙房之後，可見極考究的裝潢，設有客廳、臥室及盥洗間，廚房裡還擺著精緻的銀器和其他餐具等；機上甚至還備有一副麻將牌，可見承辦人員用心之良苦。後來那副全套銀器，奉蔣夫人指示，送官邸備用。

我由美籍機師帶飛了約六、七小時後，即告單飛，並正式將該機接收過來。先飛回南京，在跑道較長的大

教場基地，繼續熟習飛行。當機組成員對新飛機都完全適應之後，我們就將它飛回跑道極短的明故宮基地，由第十大隊負責保養維護，並由蔣委員長命名該機為「中美號」。

自1946年接收，至1952年止，該機擔任了不少任務，並訓練以汪正中為首的飛行組員。至1962年，政府計劃換裝新機，曾擬議購買噴射客機一架。我當時表示強烈反對。原因是台島幅員狹小，而元首飛國外的機會甚微，實在不必花巨額公帑去買一架不會常用的飛機；且對噴射客機的維護，我們經驗很少。而環顧世界各國，除美國有總統專機外，很少國家擁有元首專機，他們出訪多租用民航客機。我們退居台灣一隅，國難當前，以鉅資購機似不相宜。結果這個建議被接受，而改購了一架DC-6。據悉是在美國邁阿密城的一家航空公司（Panagra）新改裝的飛機。經交涉以美金三十六萬元成交。

那時，周至柔將軍已調台灣省政府主席，經國先生請我去中興新村請教他，款該由何處支付？他即打電話給台灣銀行董事長尹仲容先生，並叫我去和他談。我返台北後，即與尹先生的秘書蔣女士連絡，蔣女士是我當年在華盛頓時的好友蔣碩豪的妹妹，經她安排我去見尹先生，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。他非常痛快，直截了當，毫無官氣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除答應撥款外，也談了一些空軍的事，識見高遠。後來證明尹先生在經濟上確有重大貢獻；台灣之有今天，尹先生的功勞很大。

惜當今之世懷念尹君功勳者，已不多見，而冒名居功者則不乏其人。

錢有了著落，當即派遣汪積成上校，赴美辦理購機事宜；並安排汪正中、傅保民兩人前往美國佛州的棕櫚灣（Palm Beach）美空軍基地，接受DC-6飛行訓練。結業後，即由汪積成負責接收新機，我亦於稍後赴美。其間出售該機的尼加拉瓜航空，還安排我們飛了一趟英屬巴哈馬群島，之後就由該組人員飛回台北。座機組此時也擴編，由何以謙任機務長，並由申大堪協助。二人均是國立中央大學畢業，並在空軍機校高級班受訓，都是傑出的機務人員。

「中美號」後，總統座機又換了一架波音720噴射客機。據知用得很少，卻花費了不少金錢。關於總統座機，還有一段插曲。不知何人高見，曾去買了一架水陸兩用機，備總統出巡日月潭或南部水域之用。結果在汪正中、傅保民接收試飛時，落水失事，幸好兩人保住性命。即或不失事，總統老先生也爬不進機艙，因門太小。此事想起來真覺好笑而荒唐。

第4節 西昌行

在我擔任總統座機長十年中，有太多的事情值得一提。但下面幾件特別具有意義，我跟著歷史流動，歷史在我眼前過往。

1945年8月14日那天，我因為沒有任務，在成都勵志社和一群美軍軍官便餐。席間突然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——「日本無條件投降了！」從美軍的嘴裡，我才第一次聽到“Atomic Bomb”（原子彈）這個名詞。此種炸彈竟然如此迅速地結束一場漫長的戰爭，其威力真是匪夷所思。

第二天，蔣委員長也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，親自發表了「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」。我感到重建家園的艱鉅工作即將開始，我們空運隊應該很快就會展開忙碌的飛行任務。

過了沒多久，就接到官邸的通知：要我將「美齡號」飛往重慶待命，準備飛西昌。稍後，蔣委員長和夫人相偕登機。我們飛越西康高山，在萬里晴空的天氣下，降落在海拔六千呎高的西昌機場。

西昌位於偏遠的山區之中，但在邛海邊已經蓋了不少房子。原來在對日抗戰中，為了長期抗戰，政府不但撤到腹地四川，其後也以西昌為第二陪都，以備局勢緊急時，轉移到那裡。

蔣委員長此行輕車簡從，只有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負責接待，中央方面並無任何人相陪。蔣委員長夫婦那幾天若非在庭園漫步，就是泛舟湖上，避開所有塵囂，來此世外桃源，享受寧靜的休閒生活。那七天，蔣委員長完全放鬆自己，他連鬍子都不刮。全國皆為勝利來臨沸騰，我們陪著蔣委員長在西昌七日，和他享受美景美

食。西昌美景全在一個邛海，湖在白雲青山中，青山有千里澗水入湖，沉鬱渾厚的山與含煙裊裊的湖輝映，秋水澄澈，使這個湖成了大地最美的瞳仁。蔣委員長喜歡徜徉其上，享受泛舟之樂。當然，面對突如其來的勝利，以及千端萬緒的復原工作，我想他實在需要一個寧靜環境，思考未來的國家大計和工作方針。

另一方面，張篤倫的太太是廚藝高手，她烹飪的火腿，豐腴滑口。她甚至會自製白蘭地。張夫人的火腿配酒，至今仍難忘懷！

我們隨行而來的機組人員，每天都在一所天主教學校裡，以打籃球打發時間。天主堂裡的外國神父，也不時和我們閒聊一番。我們在城牆上看到一種美麗的花草，一位比利時神父告訴我那是罌粟花。他說若不是這次蔣委員長前來，只要一踏出城，就可見到滿山遍野的種植鴉片植物！他且斷言等蔣委員長一離開，當地人會即刻再把罌粟種起來；他似乎對當時的政府和人民有深切了解。

第5節 勝利還都

西昌七日後，蔣委員長返回重慶，然後專程視察南京、上海和北平等地。

一路飛來，我親眼目睹民眾對他始終如一的愛戴。幾乎每一個機場迎接的人潮千千萬萬，萬頭鑽動，民氣

旺盛，整個場面狂熱沸騰。人民痛苦了八年，終於苦盡甘來，大家對他的愛戴與擁護，是出自於真心的。

記得有次到上海大場機場，因歡迎的人潮太多，只好臨時改落江灣機場。

還有次到北平，蔣委員長意氣風發地走入人群中握手，整個場面亂成一團，安全人員捏把冷汗；而他在人群裡握手揮手，顧盼自雄，宛如天神一般。千萬子民用熱情和真愛來頂禮膜拜。

我目睹且參與了這種盛況，感染了這股熱力，內心也雀躍莫名。那真是近代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，萬眾一心，民氣可用，而蔣委員長也確實想為國家社會做一番大事業，他是充滿雄心抱負的。但是歷史無情，良機稍縱即逝，反而留下了中國現代史上最深沉的痛楚。

至於中國多年的沉痾，是否把日本打敗即可使國家復興起來？很多歷史家研究這個問題，我也常想在書本中找出一個答案。但是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
也許抗戰勝利是一個機會，但兩百多年的積弱，實非一場勝仗就可挽回。今天共產政權統治大陸五十年，的確把國家統一起來，經濟方面也有改進；但在他們那種制度下，要想把十二億多人口，一下子推進到國富民安的境地，卻令人存疑。自古至今，不少有學問的人從事研究「治國之道」，時至今日，到底哪種制度可使一個國家、甚至整個人類，達到「長治久安」的境地呢？

中國不幸，兩千多年來，在「皇帝專制」掌控下，人民的苦難多於安樂。自鴉片戰爭以來，外侮不斷，更增添了人民的痛苦。抗日戰爭結束，照理國家應步上「康莊大道」，無奈國人沉醉於「勝利」之中，很多政府大員以戰勝者之姿態，假「接收」之名，行「劫搜」之實，到處胡作非為，使原先光復地區對我派遣之軍公人員的熱情接待，不數月即變為極大的反感；喪失了民心，也坐失了良機。這應該是國民政府敗給共產黨主要原因之一。及至內戰爆發，神州蒙難，政府由大陸播遷來台，雖倡言反共抗俄，光復大陸，談何容易？更以常理而論，如同樣的一班人真有能力光復大陸，則何致喪失大陸？勝利初期之景象，與現下退居台灣之情況，形成強烈對比。世事變幻，令人感嘆。成敗之鑑，不是很分明嗎？正確答案，還是留給歷史家去研判吧！

第6節 節節敗退

我看著蔣總統雄姿英發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但也看到他困苦委頓，大江東去的悵惘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的大亂世來臨了！

我曾多次冒險飛蔣總統上火線。他確具軍人本色，不怕冒險犯難。在瀋陽情勢最緊急的時刻，他堅持上瀋陽看看。那時陳誠在瀋陽，大家奉命在飛機上召開緊急會議，我們飛離不久後，瀋陽就失守了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在錦州。蔣總統要親自去秦皇島視察戰情。我們飛機降落在我軍砲兵陣地的前面，我軍砲彈就直接從我們頭頂呼嘯而去，大家都有些緊張。但蔣總統卻很鎮定，他親上火線，令我敬佩。

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思索，蔣總統事必躬親，讓下層的人不敢作主。他自認天縱英明，授權和分層負責不夠。我想蔣總統在機上可能會沉思：「怎麼會被土八路打垮了？」也許這是重要的原因。

1949年1月，戰事急轉直下，共軍已進逼長江。1月20日，蔣總統正式宣告引退。隨即謁別國父陵墓，率經國先生到明故宮機場，登上「中美號」座機，逕飛杭州。接見了若干高級首長後，就回溪口老家。我在抵達笕橋以後，即飛返南京，處理空運大隊準備撤離的一切事宜。

1月23日，北平易手，我們大隊對當地的運補行動也告終止。

4月21日凌晨，共軍大舉渡江（長江）；我們的C-47機奉命空投炸彈阻擊，卻未能遏阻其行動。第二天，蔣先生飛抵杭州，與李宗仁、何應欽、張群、王世杰、吳忠信等緊急會商。然而李代總統卻在次日飛到了廣西桂林；首都頓呈空虛，情況極度不安，不久即告失守。

第7節 再度赴台會晤菲、韓總統

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次年，總統曾來台視察。但這次再飛台灣的心情，卻與前次有天壤之別。他老先生在1949年4月25日離開溪口，搭乘軍艦直駛上海，泊復興島，召開軍事會議。5月7日乘艦抵達舟山，再換搭「美齡號」座機，經過金門繞飛一週後，到了澎湖。我們在澎湖住了四天；沒有自來水，生活非常簡陋。四天後飛到桃園空軍基地，驅車駛抵大溪，一行人就住在大溪公園，原為圖書館改建的臨時官邸中。這幾天可能是蔣總統一生中最難熬的日子，痛苦的不是生活的不便，而是精神上的壓力。而上海也就在5月25日撤守了。

是年7月10日，我奉命駕C-54「中美號」座機，送老先生到菲律賓，應季里諾總統（President Quirino）之邀，前往訪問。我們降落在馬尼拉附近的一處空軍基地後，蔣先生即換搭菲律賓政府的專機，飛往碧瑤（Baguio），開始他和季里諾的「碧瑤會議」，而我們機組人員則留在原地待命。蔣先生那天刻意地穿了西裝，這麼多年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不著戎裝。

對馬尼拉，我並不陌生，因為「中美號」自接收以來，所有的重大維修工作，都委託菲律賓航空公司辦理。當時菲航的技術水準，在全亞洲首屈一指；而馬尼拉在城市建設和工商業方面都極發達，較台北先進得多。不料四十多年後的今天，菲國因政府貪污腐化，治

安不良，以致經濟蕭條，民生凋敝，人民生活極其困苦，遠落於東南亞各國之後。有人批評菲律賓在獨立後，以不成熟的社會，去學習美國式的民主，結果搞得四不像，實深值東方國家警惕。

老先生結束了碧瑤會議後，於7月14日飛抵廣州——當時的國民政府所在地，指示機宜，然後返歸台北。

8月1日，我又送老先生自台北飛抵舟山的定海，準備應李承晚總統之邀，前往訪問。不料在8月6日啟程之前，卻接到了最壞的一則消息——美國政府發表「中美關係白皮書」：指稱我國反共措施的失敗，歸咎於國民政府的無能，因此美國決定不再積極給予支持了。

此事對我朝不保夕的局勢，無異雪上加霜，我們的士氣遭到嚴重打擊。所以老先生在搭機時，神情凝重，但我們仍按原訂行程，準時出發。

在此之前，我已和王秉琳就計劃航線試航過一趟，發現韓國南部的鎮海機場，跑道非常短，所以這一次是飛雙引擎的「美齡號」前往，對短距起降比較安全。另外，我海軍還在航線上配置兩艘軍艦，隨時待命，以保障遠洋飛行的安全。

在那次試航時，周至柔總司令曾指示我順便前往濟州島勘察一番，評估我空軍未來借用該島作為前進基地的可行性。當時我的報告是：濟州島雖然腹地尚稱寬

廣，但一切設施均付闕如；如要經營這一跨國基地，困難尚多。未料數年以後，美軍勢力介入，濟州島卻成為我空軍U-2高空偵察機的備降機場。

「美齡號」在鎮海降落時，李承晚總統親自來機場迎接老先生。我們機組人員則於他們離去後，飛往漢城金浦機場待命。當晚住宿於城內最大的「半島大飯店」（Bando Hotel）。其時韓國處於戰後的蕭條局面中，整個飯店裡竟然只有我們這一群客人。而漢城城裡，到處擺滿了地攤，其中很多是出售韓國泡菜的；因此走在馬路上，處處聞到大蒜味，甚至在旅館中，大蒜氣味也很重。至於日用物品，幾乎什麼都沒有。可見被日本佔領下的朝鮮，非常窮困。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日本對朝鮮人民高度壓榨，使朝鮮物資萬分缺乏，其情況與戰後的台灣類似。

我們在漢城時，遇到幾位曾在中國空軍服務過的韓國朋友，包括前空軍第九中隊機務長金貞信上尉，以及我國空軍軍官學校畢業的飛行軍官金信，他是主導朝鮮革命建國的金九先生之子，在我們飛抵漢城的前夕，金九先生被人暗殺，漢城的政治氣氛很低沉。聽說那時朝鮮軍政界分為兩派，一派親華，另一派親日。前者的那些領導人物，在朝鮮被日軍佔領後，都逃往中國；在幾十年的淪陷期中，也都歸化了中國；我國空軍中就有不少朝鮮人，也有很多在醫藥界和影劇界的。至於後者，則都屈服在日軍的鐵蹄下，多數受過日本教育。日本戰

敗以後，親華派初期比較得勢；嗣後美國勢力逐步進入，這一派就漸漸式微了。

8月8日我們飛蔣總統返台北。對於老先生接連兩次的出國任務，原是想連絡菲、韓兩國，籌組「東亞反共聯盟」。但當時的外國媒體卻都普遍抱持譏諷的態度，甚至說：“Gimo is seeking for a haven.”意即台灣如果不保，另行尋找退路，即「避難所」。世人的勢利和現實，令人不勝浩歎。

第8節 重慶最後的日子

1949年11月14日，我飛蔣公及經國先生又回到重慶白市驛基地。自從一個月前廣州失守，國民政府就又遷回這個抗戰時期的陪都；但是代總統李宗仁未在國內，四川境內群龍無首，正陷入一片混亂。

蔣公下機後，即前往位於機場和市區之間的林園官邸，而我則帶著機組人員進入重慶市，並在空軍軍區司令部待命。晏玉琮司令正在為撤退工作，忙得廢寢忘食；他表示運輸效率不高，因而撤退工作進度緩慢。於是我就同幾位機員利用空暇，去汽車隊一探究竟；發現部隊散漫而無秩序，很多卡車並未出動執勤，駕駛們都抱怨多日未領薪餉，而所發金元券又形同廢紙。

我於是建議晏司令，將庫存的銀元，代替金元券發放下去。晏司令接受此項建議，並即刻派軍需人員辦

理。果然汽車隊立即恢復了工作效率，開始絡繹不絕地將須撤走的人員及物資，送往白市驛機場。

晏司令是位忠厚長者，對我們這些青年軍官都很愛護。在重慶緊急的時候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脫險，所以他把自己積存的幾兩金子，託我帶回台灣，交其家人。所幸在極端混亂的情況下，他仍安全離開重慶，回到了台灣。以後，我們有時也會面，我對他一直都很尊敬。

就在我們空軍正忙著將物資撤出重慶之際，白市驛民航站那邊卻還有中國航空公司的一架C-54送來大批銀元。而那些「貨物」，不知何故，卻一直未見有人前來接收；結果那些洋機師為了要迅速返航，竟然將銀元逕從機艙拋到地上，然後空機離去，罔顧機場上還有很多候機逃難的人們。那時民航局的代表——我的同學袁葆康也正在那裡，親眼目睹，卻無能為力。

這使我想，如果民航操在我們自己手中，當不至罔顧國難，而僅求自保性命。所以說，「民航是國防的一隻手」，實為至理。國防怎能控制在外人之手呢？以上所發生的事情，真是一項活生生的例證，不幸時至今日，我們民航經營者和政府主管，已忘記過去的教訓；不去建立民航訓練機構，反僱用了為數不少的「傭兵」。如台灣再遭危難，洋人能為我們犧牲嗎？

至於空軍方面，在此關頭，顯然也有很嚴重的弊端：有一天，飛行員潘文炎竟然帶了一位政府官員前來看我；那人捧著一包金條，並出示其派令公文，表示他

們一行三十餘人均是公務員及眷屬，雖已奉派前往台灣報到，但至今上不了飛機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他們聽說可以金條賄賂航空站人員，安排他們飛離重慶，但等了兩天並未排上，所以轉來找我。我對於他們的處境感到同情，而空軍站上的人，竟在此困境下，尚貪婪一群無助者的金錢，我為此甚感痛心；於是安排第十大隊為他們準備一架飛機，盡速飛離重慶。後來聽說：大陸淪陷後，那些危難中還在貪財搜刮的高級軍官，已為共黨所整肅。真是因果報應，屢試不爽。

當天晚上，這些苦候多日的男女老少，終於登上海由譚振飛駕駛的C-46，我看著這架飛機在暗夜中滑向跑道頭，然後加速起飛。不料在剛離地面後，就發生爆炸，燃起一團火光，我腦中立即浮現那些乘客登機時的景象，沒想到原先的一番好意，卻反使他們步上悲慘的道路。

正在悲痛之際，忽然發現該機駕駛員譚振飛，跑向我的面前；他灰頭土臉，嚇了我一大跳。我當時真不知道是現實還是做夢，而他的口頭報告，更令人不可思議。譚振飛的C-46剛升空時，因視線不清，撞上停在跑道頭的一輛壓路機，C-46頓時斷裂成兩段，汽油漏出而引燃大火，但並未立即延燒到機艙；於是艙內的人紛紛從大破口迅速逃出。而在這場飛來橫禍中，竟奇蹟般地無人傷亡！

於是我立即派車，前往搭救那些大難不死的乘客。

回來時，只見他們各個驚魂未定、面色蒼白。在場的空軍官兵都感到驚奇與同情，有位座機機務員楊基旭取來一瓶阿斯匹靈，權充鎮定劑，分給他們每人一顆，以作壓驚之用。如此，居然也發揮了相當的心理作用。當天又派了一架C-46把這些乘客先送到成都，等到次日又安排飛機把他們送到台灣。從此就沒有再見過面，但願他們都應驗到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」的俗語。

我們這一次在重慶逗留了兩週。起初對於共軍的動向，並不十分清楚。只約略知道從湖北宜昌及湖南芷江各有一股進向四川。為了具體掌握敵情，我的同學楊孤帆，還特別執行了一次空中偵察。他在回航後，曾親口告訴我：在通往四川的沿途上，險阻重重，「連猴子都過不來」！

不過事實卻不然，中共第二野戰軍已從貴州方向進入四川東南部，重慶已受嚴重威脅！

11月29日我們也接到準備撤離的指示。當天夜裡十點多，蔣先生一行才離開林園官邸，但通往白市驛機場的公路已被難民擁塞；聽侍從人員說，中途蔣先生等還不得不下車步行一段，才又上車駛抵機場。

「中美號」座機和兩個大隊的十餘架空運機，都在等待老先生。幾近午夜時分，才見他們一行人抵達，其中包括蔣經國、顧祝同、俞濟時、陳良、吳嵩慶等人。

蔣先生一言不發，登上座機，進了艙房，即行就

寢，沒有任何行止的交代。大家都不知所措，又無人敢上前請示，只好全部站在C-54下等候。

當時的白市驛機場，只剩一個營的警衛部隊，分散在機場周圍，負責安全警戒。半夜時分，傳聞共軍已出現在江津附近，於是趕緊派出一連兵力前往抵擋，當他們抵達預定位置時普通電話，使大家略為放心；但是沒過多久，這個連就失去連繫，顯示他們的位置也出了狀況，如此一來，整個白市驛機場隨時都暴露於危機之中。

這時所有在場大員都很著急，但仍沒有人敢去驚擾蔣先生。最後，參謀總長顧祝同竟要我前去報告，因為他認為蔣先生偶爾會聽從駕駛員的建議。

我只好登上飛機。幸好艙房中此刻已有動靜，原來蔣先生已起床，正在洗臉。我把緊急情況稟明，建議盡快起飛。他只簡單地回答：「好吧！」似乎他也了解到這已是最後一刻了。

蔣先生的一聲應允，解除了所有人員心頭上的負擔。當我啟動C-54之際，全場的空運機也一呼百應，整個機場都沸騰起來。我們在黎明時分，終於離開了白市驛機場，一個小時後，安降成都附近的新津空軍基地。

第9節 成都到台北

在我們從白市驛起飛後，蔣總統派吳嵩慶沿重慶至

成都路上，給部隊發錢慰勞，但這遲來的獎勵，並沒有達成阻止共軍前進的目的。我大隊也獲獎一萬銀元，當即交飛行員阮幼仁帶回嘉義，用作全大隊的福利基金。另外，在白市驛緊急撤退之際，很多物資仍在倉庫未動，而我隊員則被允許「各取所需」——大家拿了很多手槍；但返台後均原數交回。白市驛撤退之時，地面待命人員，包括一些文官，均一哄而上，強登飛機。但飛機載重有限，為了搶救人員，各機長命令乘客拋棄所攜物品，否則無法起飛；於是大家齊扔行李，最後連所攜銀元都扔了滿地。危險時刻，人命還是最寶貴！

在西北方面，胡宗南四十萬大軍守不住西安，一路潰敗到西昌；宋希濂也守不住鄂西與川東。我們赴成都之前，也曾派機送蔣經國去雲南，並接盧漢到重慶。據聞是奉命研商雲南軍事問題。結果，盧漢回滇後，最終還是在12月9日「起義」投共了。這一來，整個中國西南都失掉，大勢已不可為。

由於成都已現亂象，行政院長閻錫山帶著行政院要員先飛台北。蔣總統則在成都守到最後一刻。

此時，我做了一個極重要的決定：「中美號」本停在成都新津機場，從當時蔣公駐蹕的軍校到新津機場要橫越整個成都市。以當時市內狀況，交通完全中斷，紊亂不堪，蔣總統要到新津機場將極為困難。於是我將飛機飛到城北鳳凰山機場，因為從軍校有條小路通往鳳凰山，如情況緊急，可安全而迅速的到達機場。

1949年12月10日，成都整個局面已難控制，當天下午，蔣總統及蔣經國即由少數侍從人員，循這小路護送到鳳凰山。當我們起飛後，地面留守的憲兵部隊也就相繼撤退。我們從此離開大陸，飛向台北。千山萬水，不勝依依，這一飛，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！

我們飛走後，成都、西昌、拉薩陸續失陷，大陸全面赤化。

第10節 與總統相處情形

很多人都認為蔣總統很有威嚴，也很專制，因此見他時，常囁嚅不敢言。但蔣總統和經國先生在搭乘飛機時，態度溫和，從不過問飛行問題，全權由機長做主決定。十年來，蔣總統只問過一次。有一天他召我去官邸，告訴我他要去瀋陽市視察，問我航線要經過哪些地方。我當時想：飛行航線上已有數處為共軍佔領，我們以不從其上空經過為宜；說明後，他對我計劃的航線點頭認可，這次任務也順利完成。

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：有次因有要務，須即刻從徐州回南京。當時南京正下大雨，而蔣總統已經抵達徐州機場，準備登機；可是天候不佳，幕僚竟然沒人敢去報告。我只好親自去面報總統，他老先生說：「我在飛機裡等好啦！」等了相當的時間，天氣似有好轉，我建議

起飛，並請示如南京不能降落，可否改飛上海？蔣總統很親切地說：「可以！」結果還是安全的降落南京。我很欽佩他尊重專業人員的意見。

我除了自1943年至1952年，擔任總統座機長外，後來奉命籌組空軍第卅五中隊（黑貓中隊）時，也時與總統見面；他對空軍的專業，也是十分尊重。

中國人太注重輩分情誼，也常將對長輩、長官的尊敬，混淆變質，成為對權力的服從，導致下位者唯唯諾諾，不敢伸張義理；這就是權力與權威超越了真理，濫權所滋生的弊端。

蔣總統給人專制的印象，可能很大的一部分，是下面的人自我設限，唯唯諾諾，大家都不敢吭聲。其實，做任何事要以理為重。所謂權力，只是隨著執行任務所需要而產生，絕不是伴隨個人的身分、地位而來。有此認識，才能有所為、有所不為，做個有擔當、不畏勢、不濫權的現代人。

蔣總統真的深愛著中國，以及中國的土地。他常常到駕駛艙來，凝視著萬呎下的大地、山川，以及一起生活在這塊大地上的人。記得有次由南京飛北京，經過泰山，他特別命我繞一圈，泰山雖然與北斗並稱，有所謂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其實它的高度只有五千呎。當時天氣很好，「南天門」、「捨身崖」等處都看得很清楚。由空中看泰山，有它特別的美麗和壯觀。我猜想他

當時的心情，必然是感慨萬千：江山雖美，但戰亂不已，民不聊生、不可終日！

另外，有些人說他是「武夫」，其實他也算是「儒將」。錢穆先生曾說：「蔣總統戎馬倥傯，軍事叢脞，迄未有寧。然而始終不廢讀書，兼及著作；其所讀所說，皆我中華民族傳統精旨所繫。」這幾句話是事實。

蔣總統愛讀書，也愛看縣誌，每次飛到一個地方，都要索縣誌來看。在上空觀察大地，整個中國都在指掌中。有次我們從南京起飛，經過安徽巢湖，有個小地方叫做「三河」，他對我說：「三河是當年曾國荃練水兵的地方。」

民國四十、五十年代的發展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蔣公在臺灣用心之苦，慮事之深，確實使國家命脈綿延不絕；他將黨務、軍事和政治都從危疑震撼中轉危為安。

但是他有一項不得不然的執著：狂熱地一心一意想反攻大陸，並且希望美方協助我們。

美國人抓到他此一心理弱點，往往予取予求。在我代表中方與美軍交涉的過程中，明顯地察覺到美方不希望戰爭，絕不會幫我們反攻大陸，只是一味敷衍蔣總統。另一方面，美方也確實希望台灣能成為圍堵共產主義的據點，因此所有軍援均以防衛為主。但不可否認，美援在台灣經濟復甦中，扮演過主要角色。當然，蔣總統的「反攻大陸」是否有其他（或對內）的政治著眼，則非我所能揣度了。

抗戰勝利後不久，百事待興。有天他去西安，途中飛過鄠縣，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字，蔣總統也唸不出。四天後，回程重慶，起飛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告訴我：那個鄠縣，應該唸尸乂、，是中國古史上的一個要地。可見他小心求證、實事求是的精神。

蔣總統極少回溪口老家，但他內心極思念溪口。我們出任務若是航線接近溪口，他會要求到溪口上空繞一圈，深深看幾眼，並特別要看王太夫人的墓。

所謂溪口，是錦溪的口。錦溪由奉化西北而來，在溪口附近與剡溪會合，流到武嶺，被五個小山阻擋，迴旋而成水量較大的一段。因此吸引了二百多戶人家沿溪定居，發展成溪口鎮。

溪口極美，杜甫說：「剡溪秀異」；李白說：「剡中水石清妙」。溪口的水美，山更美，張其昀先生曾讚美其具有天台山的雄偉，雁蕩山的奇秀，天目山的蒼潤。

民國38年，局勢已極險惡，蔣先生決定飛台灣。寧波起飛後，先到王太夫人墓前繞飛一周，可以看出蔣總統的孝心。他知道一時可能回不了溪口，但他一定沒有想到，那是他此生最後一次看到溪口鎮。

兩岸開放後，我有機會重遊溪口。五十年前曾多次前往，如今站在溪口，人事全非，恍如夢中。五十年來，溪口花自爛漫，鳥自清囀，武嶺還是奇秀蒼潤，只

是當年的飛虎青年卻已華髮早生。在溪口看到了蔣總統題的一首詩：「雪山名勝擅東南，不到三潭不見奇，我與林泉盟在夙，功成退隱莫遲遲。」蔣總統最後還是對溪口的林泉，爽了盟約。

我與蔣總統相處十分自然，從不緊張。但是他周圍的人卻顯得緊張，有些怕他。蔣先生是有一股威嚴，但我不伐無求。我非常尊敬他，他也信任我；我是機長，他是我的乘客，如此而已。

他也很愛護我，譬如每次出差，蔣先生總會給大家一些零用金，給我的數目與給黃埔一期的總統府侍衛長俞濟時和吳國楨先生同級；那時我只是個中校飛行員，隨員中濟濟多士，老先生將我放在最高等級，使我有被過於重視之感。蔣總統請客，尤在宴請國外貴賓時，有時邀我參加。有次在溪口蔣公全家聚餐，也邀請我們參加。蔣先生喜用寧波口音，稱我太太為「復恩娘子」。

我雖然有很多機會接觸蔣先生，但我從不談飛行以外的事，從不替人傳話關說，更從不自誇。我曾讀到一段話，一直深深記在心中：「上貴不伐之士，若不伐則無求，無求則不爭」。「不伐」就是不誇張的意思，亦是古人所說「無欲則剛」；大半喜歡炫耀自己的人，背後都有所求。

第11節 我與蔣夫人

我與蔣夫人的第一次接觸，是她首次坐我飛機去桂林，那趟落地非常平穩，蔣夫人下機後特別對我說：

“The landing was extraordinarily smooth!”

蔣夫人好客，也很體諒人。抗戰勝利還都，我送夫人去上海，她叫我在上海等她。我說：「運兵很忙，需要我去調度。」她說：「等把我送回重慶後再說。」我只有遵令留守待命。期間她叫我們去她的住處吃飯，預備了很豐富的西餐，氣氛非常輕鬆，使每個客人（都是我的機組員）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。她讓大家抽煙，她自己也抽。在那個場合，我實在看不出她是第一夫人；也可以說她的舉止，和在官場上相比較，判若兩人。她的本性與蔣老先生之嚴肅拘謹相配，實在是一件外人難以了解的事。

後來蔣夫人代表我政府，到長春與俄國人談判，也是我飛夫人去東北的。她的雍容大度，令俄國人折服。

1952年我奉派去美國當武官。有次去看一位很好的朋友。他住在喬治亞州梅肯市（Macon）附近，他的鄰居淡水夫人（Mrs. Freshwater），是蔣氏三姐妹在美國中學時代的同學，而且很熟。她託我帶一個粉盒給蔣夫人。等我回國後，將此事告知蔣經國，他說：「我幫你送去好啦！」事後聽說夫人不大高興，我倒是對此事並不在意；但覺得回國後未親自去見她，似乎有所失禮。因為

我赴美就任之前，她找我同瑛華去官邸喝茶，並對我的工作多所垂詢，極表關切。我到任後，每逢她來美，也常召見我。

記得有一次，她由台飛美，我去舊金山接她，下機後並陪她乘救護車去一家醫院。路上她問我：「C.K.是怎麼搞的？」C.K.就是吳國楨，他在辭去台灣省主席後赴美，掀起一場很大的風波；他曾對我政府，特別是對蔣經國，有所批評。

我報告夫人：對此事，我所知道的僅限於從報上看到的資訊。據我所知，此事在僑界，甚至在部分美國人中，確實發生很大的震撼，其他我就無所知了。

雖然我認識吳國楨（他的連襟蔡君是我的至友），但在美國從未晤面，也無其他接觸。等我任滿回國後，有時與一些軍中將領一起蒙蔣總統召見，夫人總是和藹可親地與我握手。因此我覺得別人所說她對我有所不滿，僅屬傳聞而已。

第12節 孔二小姐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令偉，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孔二小姐。瑛華的大嫂與孔二小姐很熟，因此我們也與孔二小姐相識。

有次我與瑛華在上海逛街，路經孔二小姐辦公室。靈機一動，我倆就上樓去拜會她一下。她的辦公室裝潢

得又大又氣派，她坐在黑色大辦公桌後面，幾乎看不見她這個人。她對我們很客氣，並以蛋糕、咖啡招待，她忽然開門見山的說：「衣復恩，戰爭已結束，你何不來我公司幫我！」並說她的公司（好像是揚子公司或嘉陵公司）非常賺錢，獲得三十多種進口貨的專利權。

那個時候在上海，三十幾種進口貨代理權，本身就是暴利，非常誘人。但我婉拒了，因為我與她的道太不相同，甚至相當反感。

有一次孔二小姐與蔣夫人同機回重慶，在飛機上我問她：「上海小報說妳在黑市賺了很多錢。」她笑一笑說：「剪報我都帶在身上。」並從西裝口袋掏出一疊給我看，接著對我說：「衣復恩，我們家中本來就有錢，你曉不曉得武漢撤退前，我們把法幣全換成美金，所以我們的財產毫未貶值。」

我忍不住回她：「妳爸是財政部長啊！當然比別人有眼光！」她唯唯不答。

之後我們就很少見面。官邸的人後來告訴我：「孔二小姐盡在夫人面前說你的壞話。」我相信是真的，但不以為意。

第13節 結尾

「美齡號」除役後，停在岡山空軍官校軍史陳列館供人觀賞。1995年9月21日，空軍總司令唐飛上將邀我

前往參觀；再度看到「美齡號」，整整五十多年了。許多的往事襲上心頭。我上駕駛艙坐了一會兒，感慨泉湧：當年少年二十時，一身轉戰三千里，一機飛越百萬師；如今再握駕駛盤，機已衰朽，人已白首，王維的〈老將行〉，竟成了此刻我的心情寫照。

我與當年同組機員汪正中、王堃和等在「美齡號」前合影留念。將五十年前的往事，也全收入快門中了。

「美齡號」和「中美號」，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興亡，歷史的喜與悲。研究羅馬史的學者，把帝國衰亡的原因歸納為：羅馬本來的民族特質是恬靜、質樸、勇敢、耐勞和克己。他們因受了家庭生活的培養、共同幸福的鼓勵，和軍事角逐的訓練，已成為一種犧牲自我、尊重公益、嚴守秩序的優良民族。所以能以區區小城，勃焉而興，征服了世界。後來呢？犧牲精神為淫奢所腐化，公共福利為君王所摧抑，耐勞的習慣為奴隸所取代，獨立自主的血統為諂媚成性的異邦人所混雜。這樣，羅馬帝國之衰亡，怎可避免呢？

大陸的淪陷，以我所見，實非為共軍所敗，而是敗在我們自身的無能與腐敗。現在身在台灣的我們，看看台灣跨世紀的世局，能不深自警惕嗎？

英文裡有一個字叫charisma，按照韋氏字典的說明是：“A special quality of leadership that captures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inspires unswerving allegiance and devotion.” 按照英漢四用辭典翻譯是：「天縱才能」。

而我認為，它的含意似乎應該是：「親和力加上明斷」。

美國人曾經舉出兩位美國總統來說明此字的意義，一位是尼克森，另一位是甘迺迪。前者的學識、能力、口才及對政治的了解，都不比後者遜色。但甘迺迪有 charisma，而尼克森則無。在甘氏周圍的人，和與他接觸過的人，很容易被他所融合，中間很少隔閡。而尼氏則缺少這種對人的親和力；很多人與他共事多年，但始終在他們中間有個距離，難以融合為一體。

到今天，人們對甘氏的評估，高出尼氏很多。研究人性的，歸結於甘氏的親和力和明斷，高出尼氏很多。

有人以此標準評斷蔣公：他在某方面確實天縱才能，但是他明斷果決有餘，而親和力不足，似為允當之語。



1948年總統蔣公下野後與夫人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故居。
後排左起：熊丸、孫義宣、侍衛、醫官、本人、陳希曾、宋子安、俞濟時、侍衛長石祖德、周宏濤、曹聖芬、夏公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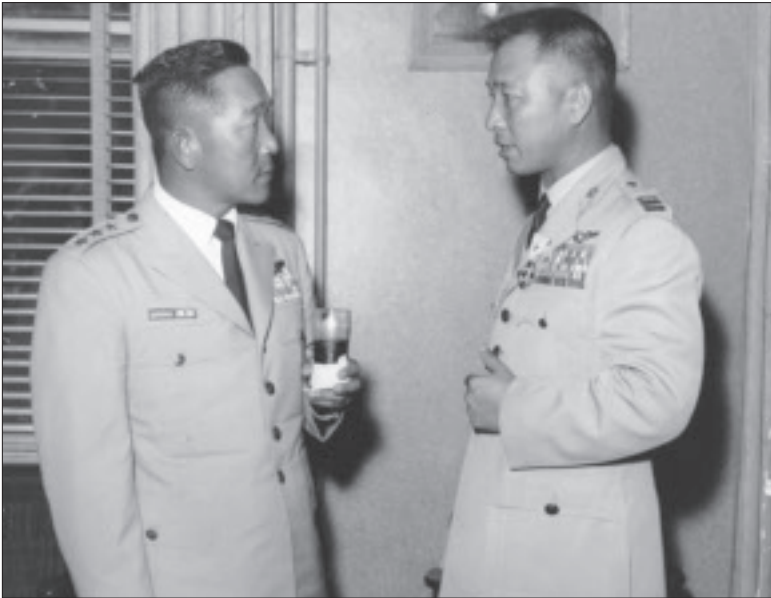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，蕭瑛華（右）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攝於溪口。



1952年總統蔣公賜贈親筆簽名玉照，拍攝於「中美號」總統專機座艙內。



蔣夫人美齡女士贈送之親筆簽名玉照。



1960年代與韓國空軍總司令金信將軍（左）在漢城重聚（金信將軍畢業於我國空軍官校）。